



复旦文史专刊之四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编

# 世界史中的 东亚海域



中华书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复旦文史专刊之四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编

# 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 /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 —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12

(复旦文史专刊)

ISBN 978 - 7 - 101 - 08083 - 4

I. 世… II. 复… III. 海域—历史地理—东亚—文集  
IV. K931.0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1154 号

---

书 名 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  
编 者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执行编者 朱莉丽  
丛 书 名 复旦文史专刊  
责任编辑 李 静 胡 珂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5¼ 插页 2 字数 230 千字  
印 数 1-15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8083 - 4  
定 价 39.00 元

---

#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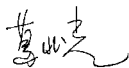
历史研究以时间为序，也以空间为界。过去的历史著作常常以“世界”或“国家”为名。世界史(world history)无所不包，论述空间的边界仿佛不是问题，但近来也有学者提出，看似全面的“世界史”，其实，常常是有“圆心”(撰写者位置和立场)、“远近”(距离撰写者圆心远近决定不同详略)、“边缘”(重点论述与一般概述)的，如果没有轻重详略，便只是各个国家历史的集合，所以，还不如强调联系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而国别史(history of state)以国界为界，看起来似乎没有问题，但是，由于国家“领土”在历史中也常常移动不居，很多现代民族国家的边界只是晚近才逐渐确定的，因而“历史”并不乖乖地拘守在现在的“国家”(领土)内，即使“政治权力”常常与“国家版图”重叠，但文化、宗教、经济却常常越出国界，这使得国别史的写作遇到困难。

就是在这一学术史背景下，历史学家试图重新寻找一些描述历史的空间。在这方面，我们要承认年鉴学派史家布罗代尔(一译布劳岱，Fernand Braudel, 1902—1985)的影响，他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讨论的是16世纪地中海周边诸国尤其是土耳其和西班牙的历史，他以“地中海”为空间，描述了一个在种族、宗教、政治冲突与融合上异常复杂的区域历史，这部名著给历史学界的启发之一就是，以海路交通作为纽带，把环东海周边作为彼此有关联的网络，是否也可以形成一个新的“历史世界”？

这便是羽田正教授建议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合作召开一次“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学术讨论会的由来。我想，羽田正教授正是因为世界史研究的兴趣，和对重写区域史的思考，提出这一研究设想和会议主题的。我当然同意对这一设想和主题进行讨论，尽管我和羽田正教授的学术背景、思考方向和关注重心不一样，但是，我们都觉得这种差异恰恰可以

呈现讨论的意义,相反彼此相同反而淡化了交流的价值。有趣的是,在这次会议中,我们就清楚地看到彼此的差异。日本学者显然深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像冈元司教授讨论环境,吉尾宽教授讨论季风、海流、航路,中岛乐章教授、向正树博士讨论贸易,藤田明良教授讨论居住、移民和产业,显然来自布罗代尔的启发。(布罗代尔《地中海》一书第一部分就是描述原地中海沿岸的自然环境,第二部分就是讨论地中海沿岸的经济和社会。)而中国学者则不同,在这一会议上,他们更多讨论的是东亚的文化和政治(张翔、陈波)、诸国之间的相互认识(朱莉丽)以及社会与风俗(王振忠)。在这些微妙区别中,或许可以看出中日学术世界的不同。当然,可能更要提到的,是对于区域史和国别史的认知差异。一般来说,日本学者比较接受区域史研究的新趋向,这也许和他们兼涉亚洲的东洋史传统有关,而中国学者却比较恪守国别史的传统,这也许和中国史本身的自足性有关。我们很有兴趣进一步探讨,究竟这种学术取向的差异背后,深层原因是什么?当然这里不能简单评说,更不能轻易下什么结论。但很让人高兴的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都愿意接受歧见,而且也乐意彼此沟通,尽管要真正能够完全相互理解,也许尚需时日,不过,沟通就是理解的开端。

在编这本论文集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个不幸消息,这次会议的参加者,也是本论文集的作者之一的冈元司教授因病去世,这让我们回忆起上海会议上那个瘦弱而安静的身影,让我们祈祷他在天之灵安宁。



2010年7月

# 目 录

序 ..... 葛兆光(1)

东亚海域史的实验 ..... 羽田正(1)

从“西域”到“东海”

——一个新历史世界的形成、方法及问题 ..... 葛兆光(11)

环境的作用——围绕海洋的日常生活的结构 ..... 冈元司(23)

东亚海域世界史中的海洋环境 ..... 吉尾宽(41)

1250—1350 年——开阔通畅的海 ..... 向正树(53)

被掳人、漂流人及明代的海防军

——以朝鲜史料《事大文轨》为中心 ..... 陈 波(59)

明代朝贡贸易体系的变化与重组 ..... 中岛乐章(85)

纷扰的海域与错杂的日本像

——倭寇背景下明代人的日本认识 ..... 朱莉丽(115)

分别共存的海 ..... 藤田明良(129)

隔离的政治体和共生的文化圈

——日本近世后期的儒学官学体制化和东亚海域的

交往 ..... 张 翔(155)

18 世纪东亚海域国际交流中的风俗记录

——兼论日、朝对盛清时代中国的重新定位及其社会

反响 ..... 王振忠(171)

大航海时代以后日本人对外界与自身的新认识

(17—19 世纪中叶) ..... 徐静波(199)

跨国史视野下的东海研究 ..... 杜春媚(211)

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

——以三个百年为中心(1250—1350、1500—1600、1700—1800)

..... (223)

# 东亚海域史的实验

羽田正(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 绪论

我们自 2005 年开始了题为“东亚的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的共同研究课题(课题组负责人是东京大学副教授小岛毅),时期为五年,这一课题获得了日本文部科学省科研经费资助。这是一项以文学、史学、哲学为中心的人文科学各领域为主、此外还包含了一部分理科领域、总计有 150 人参加的大项目。这项共同研究的目的在于对在东亚海域上频繁展开的人员与物品的交流历史进行多学科多领域的综合分析,以此来重新探讨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过程<sup>①</sup>。

在这项共同研究的框架内成立的,由对海域史有兴趣的研究者组成的“东亚海域史研究会”,自 2007 年 4 月初第一次研究讨论会开始,一直到 2009 年 6 月在复旦大学举行的会议为止,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共进行了二十多次讨论会,这一研究的参加者共有三十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年轻学者。

我们将这一研究会的活动,看作是一种人文科学的革新运动。我们设定了“东亚海域”这一实验“场”,研究会参加者共同对这一“场”的历史进行综合的考察,以此来改变已经陷入了极端专业分化的现代历史学和人文科学的框架和研究方法,并试图对这些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我们研究会的最终目标,是出版一部汇集了我们研究成果的著作。

---

① 请参阅这一共同研究的网页 <http://www.l.u-tokyo.ac.jp/maritime>.



2008年12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葛兆光院长访问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之际,我作为东亚海域史研究会负责人之一向葛教授就这一研究会的宗旨和现状进行了说明,并表示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希望去复旦大学访问,将我们讨论的情况向同行们做一报告,并倾听中国研究者们的意见。因为我们共同研究的课题,当然与中国的过去有很大的关联。中国的研究者对我们讨论的内容是如何看待的,将会做出怎样的评价,对我们的研究而言,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葛教授欣然同意了我的建议,并表示不只是日本学者作报告、中国学者发表评论,而中国学者也可向日本方面作报告。于是就诞生了一次正式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此谨对葛教授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相关人员的热情和好意表示由衷的感谢。

本文即是这次会议中日本方面6名研究者报告的总论,将就我们东亚海域史研究会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所具有革新性的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 我们尝试的革新性

我们认为,这一研究会的尝试具有如下三点独创性、实验性的意义。

### 1. “海域”概念的引进和开辟新的世界史方向

欧亚大陆东方的历史,此前通常都是以日本、朝鲜、中国等“国别”为单位被人们所理解并加以叙述的。我们在这里引进“海域”这一新的概念,用这样的概念重新认识欧亚大陆东部的过去,试图追求一种新的历史解释的可能性。并且,我们将以海域史这一历史学研究的新方法,来力图克服原先认为将多个国家和文明圈、地区的历史合在一起就是世界史的旧的世界史观。

### 2. 时间序列史的相对化和历史的模式化

一般来说,历史学家都是按照时间的序列对某一对象乃至空间的历史进行理解和叙述的。相对于这一方法,我们试图进行的方式是,即便在地理上是对同一个位置加以考察,但在时间轴上选取三个不同的时期,同一视点所见到的历史在各个不同的时期将会呈现出怎样的景象,我们对此将尽可能地进行模式化的叙述。在时间序列史的相对化和历史的模式化这两个方面,我们的实验可以说具有某种历史社会学的方向性的意义。

### 3. 由团队来展开的共同研究

在人文科学方面发表共同研究成果的时候,往往采取论文集的方式。即是一种在某一个统一的标题之下,共同研究的参加者各自独立撰写论文,然后将其汇总起来合成一本论文集。这一形式在显示对某一主题可能有的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和见解方面是一种有效的手段,但是也存在着一弊病,即撰稿

人的见解和论点往往不统一,结果对于读者而言,搞不清这本书总体上到底在主张什么。

有感于此,我们采用一种由团队组成的共同研究的体制。这是一种与理科的研究室中所进行的共同研究相似的方式。执笔者团体事先要进行细致全面的商议,并进行反复的相互批评,汇集参加者对于共同研究的各种信息,在全体成员同意的情况下,将整体的研究成果进行明白的展示,具体在后文展开。最终是共同来撰写论文,研究成果为全体成员所共有。

以下对这三个尝试再进行详细的说明。

## “海域世界”和“海域”

在历史学研究中,“海域世界”这一术语经常被使用。在英语中,这一词语一般用 maritime world 或者是 thalassic world 来表现。

“海域世界”这一概念的缘起,始于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 Braudel)著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sup>①</sup>。他试图将地中海这一海洋置于中央,并将这一片海和周边的历史从整体上来加以把握并进行叙述。他还认为,在理解历史的时候,必须同时意识到“地理的时间(环境和人之间的历史)”、“社会的时间(各种各样人的集团的历史)”、“个人的时间(事件的历史)”这三个不同的时间的脉络。他在著作的开始部分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他强调了地中海及其周边的自然地理和环境等对这一地区历史的展开所起的重要作用,并认为这是一个长期持续的结构。他的这部著作,对当时以民族国家的框架来把握和理解人类过去历史的历史学界给予了很大的冲击,并对后来的历史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将海洋置于中心的历史理解的方法,此后在印度洋和东南亚,甚至在东海和南海也得到了应用,取得了很大的成果<sup>②</sup>。在日本的历史学界,“地中海(海

① Fernand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 (Paris: Colin, 1949, deuxième édition révisée, 1966).

② K. N. Chaudhuri, *Trade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an Economic History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17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A. Reid,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 2 vol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1993); R. J. Barendse, *The Arabian Seas 1640—1700* (Leiden: Research School CNWS, 1998); Angela Schottenhammer (ed.), *The East Asian Maritime World 1400—1800: Its Fabrics of Power and Dynamics of Exchange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7); F. Gipouloux, *La Méditerranée asiatique. Villes portuaires et réseaux marchands en Chine, au Japon et en Asie du Sud - Est, XVIe - XXIe siècle* (CNRS Edition, 2009).

域)世界”这一概念的意义已毋庸赘言,甚至设定“大西洋(海域)世界”、“印度洋(海域)世界”这样的空间来思考历史的方法,也已经与三个不同的时间概念这一思考方式一样,获得了相当大的认可。

我们的这次尝试,初一看,似乎也延承这一系列的“海域世界”理论。确实,就将大海置于中心来重新思考日本、中国、朝鲜的历史这一点上,我们很明显地受到了布罗代尔以来的方法论的影响。这一点必须坦率地加以承认。但是,至少在日语的“海域世界”这一概念中,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弱点。我们试图克服这一弱点,用新的方法来考察历史。

“海域世界”的弱点,指的是它将历史研究带到新的封闭性的地理框架内的危险性。今天历史研究中所使用的“海域世界”这一概念,一般指的是地中海或印度洋等具体的海洋和包含其周边陆地在内的地理空间。它在设定一个“海域世界”的时候,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找出这一空间与其他空间相异的特征,或是从这一空间内发生的事件中找出某种关联性。确实,若要从超越了民族国家国境的更为广阔的空间中去探寻其历史现象的共通性或是关联性、并认为仅仅囿于一个国家的范围之内对其历史进行叙述是有相当局限性的话,这是一个极为有效的空间设定。

但是,当人们使用“A世界”这一词语时,已经认定了这一空间具有与“B世界”或“C世界”不同的某种特征和体质。如果我们联想一下“伊斯兰世界”和“欧洲(世界)”的话,恐怕就能很容易理解这一点了。在论述“海域世界”的时候,情况也是一样的。事实上,乔杜里(C. N. Chudhuri)和日本学者家岛彦一已经设定了一个具有另外特征的“印度洋海域世界”,并对其历史进行论述<sup>①</sup>。说起来也很具有讽刺性,“海域世界”这一概念原本是不满于在一个国民国家的封闭性的框架内来理解和叙述历史的做法才产生的,虽说它的范围较民族国家为广,却又重新设定了另外一个封闭的世界。

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用“海域”这一概念来替代“海域世界”。虽然从词语上来说比较相似,容易混淆,但两者在概念上应加以区别。

再进一步考虑一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当人们以海洋为中心设定一个空间的时候,应该把握的空间范围会因你要去捕捉何种的特征或关联性而变得不同,海洋周边的陆地应该包含的范围也会不一样。

我们举几个空间的例子吧。帆船航行的范围,沉香生产和流通的范围,某一政治社会(中华王朝、江户幕府等)的变化跨越大海之后对别的政治社会所

---

<sup>①</sup> Chudhuri, op. cit. 家岛彦一《海域からみた歴史—インド洋と地中海を結ぶ交流史》,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6年。

产生影响的范围,某一政治权力对于海洋及其周边沿海地区发生影响的领域的总合,筷子使用的空间范围,妈祖信仰传播的范围,基督教被禁止的空间,用汉字可以表达意思的范围等等。当我们将中国东海置于中央的时候,上述这些空间都可在这一海洋上扩展开去,但周边部分应该设定在哪里,则因空间的不同而会有各种不同的情形。

我们将这种在地理意义的海洋上如此多样的假想空间(也可以将其设想为类似电脑制图中所使用的多重画面组合)内交错叠合的总体称之为“海域”。这些画面的大小并不都是一样的,比如说,18世纪帆船所航行的范围与基督教被禁止的空间当然不会一致。因此,“海域”的周边部分的界限并不是很明晰的。一幅画面的范围甚至有可能波及整个地球的空间。银的流通范围就是这样。很自然,名称各异的“海域”,往往会在某一地理的空间中产生叠合。比如,丁香产地的摩洛克群岛,可以包含在地中海、印度洋和南海等多个海域之内。

因此,当我们不将“海域”限定在一定的空间范围之内时,才可以将海域史从“封闭在一定空间内的时间序列史”这一以民族国家史为代表的以往的历史叙述所框定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反过来说,不应该按照时间序列的方式来研究海域史。以时间序列的方式来理解和叙述某一海洋及其周边的历史,这是“海域世界史”的工作。我们所使用的“海域”这一概念,说到底是对以往的历史理解重新思考的一个实验场。在此后,还有一个更为巨大的任务在等待着我们,即如何打破原有的将民族国家历史与文明史等捆合在一起的世界史的叙说方式,以新的视角对此加以重新解说。我们现在的工作可谓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进行的前期基础工作。

## 东亚海域

下面,对作为我们实验场的东亚海域,做一个具体的说明。在我们的研究中,放置在我们视野中心的是东海(加上黄海)。在这一海洋和周边的空间,可以叠置好几张画面吧。当我们在设定这个画面多重叠合的东亚海域的时候,对其过去的历史能获得怎样的理解,开展怎样的叙述呢?这才是我们最为关切的课题。

提醒各位注意的是,当我们将东亚海域置于视野中心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欧亚大陆东部的历史应该以东亚海域为中心来加以把握,我们也并不认为这就是欧亚大陆东部历史的起点。我们所设定的东亚海域,是为了以新的视角来重新考察世界历史的一个研究假说。这并不表示我们将这一空间看作一个实体,我们要对这一区域的历史进行时间序列式的描述。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将东海(加上黄海)置于视野的中心呢?这是基于如下的理由。即,有关这一海洋及其周边的历史,已经有了丰富的日语研究文献的积累,存在着浩瀚的史料可供详细的研究,此外,共同研究的参加者都是日本人。也就是说,是出于技术性的、有现实操作可能性的理由。因为我们是在做实验,视野的中心也可以是南海,不一定是东海,但是遗憾的是,目前阶段,这一领域可供研究的材料非常有限,我们日本研究者的能力也不够。

不过,即使我们将东海置于视野的中心,我们在考察某一商品的海上运输和流通的时候,恐怕也会涉及到南海和东南亚的岛屿地区,并进一步将视野拓展到欧亚大陆的西面。我们在论述政治权力范围的时候,也有可能包含中国的东北地区甚至是内陆地区。再重复一遍,对作为空间的东亚海域的范围,无法加以明确的界定。

这里重要的,是我们试图将原先已经固定的历史认识暂且回到一张白纸状态的态度。此前,我们已经过于习惯以日本、中国这些以“国家”为中心的国别史的历史观。当然,既然事实上存在着这些国家,这样的认识也不是说不需要。但是,这样的认识不是绝对正确的。当人们试图重新构建一部将各个国家融为一体的(我们认为,这正是现在人们所需求的)、而不是此前的把单个的民族国家史集聚在一块儿的世界史的时候,将“民族国家”史相对化的历史理解方式是必须的。从这意义上来说,设定“东亚海域”这一实验场,应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我们所使用的“东亚”这一词语也有必要稍加说明。这一词语是日本的社会和学术界长久以来讨论的对象。有人提出质疑说,这一词语显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具有强烈政治意识形态的地域概念,为何还要继续使用?这一质疑当然有道理。我们之所以使用这一词语,是基于如下三点理由。一,我们这次学术尝试的母体、已经获得了经费资助的共同研究课题的题目是“东亚的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我们必须遵从这一主题;二,日语中在表达包含中国大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这一地理空间的时候,除此之外并无合适的词语;三,我们若能使用“东海海域”这一名称那当然是好的,但是即使我们将东海置于视野的中心时,也不得不对南海周边的动静给予充分的关注,若单纯的使用“东海海域”这一概念恐怕会引起误解。如果注重词语的中立性的话,也许使用“欧亚大陆东部海域”这一词语更为贴切。这一点,在我们中间将继续开展讨论。

这里不再对“东亚”这一词语展开深入的探讨,与西亚和南亚一样,这里只是出于方便,将此作为一个单纯的地理用语,以表示亚洲东部的意思,希望各位予以理解。

## 东亚海域的三个时期

我们这次尝试的第二个重大的革新意义,是对历史的理解和叙述的方法。上文已经述及,对东亚海域的历史若按时间序列来理解的话,就与“海域”这一概念的本意不相吻合。于是,为了明确揭示这一海域的多层叠合性、多元性以及各个时代分别具有的不同特征,我们选取了三个时期(分别为一百年),用模式化的方式来分别描述各个时期的特征。这是一种不同于以往按照时间序列的联系来理解过去的通常的“海域世界史”的叙述方法,如上所述,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方法避免陷入以封闭的空间为单位的歷史叙述中。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会放弃按照时间序列的叙述和理解。我们会根据需要随时使用时间序列式的解说。本文所说的“模式化”,是指选取某一个一百年的时候,用集中焦点简明扼要的形式来揭示出什么才是这一时期的特征。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显示一个静态的模式。

三个时期,具体如下:

(1)1250年—1350年,(2)1500年—1600年,(3)1700年—1800年。

此外,按照每一个时代我们设定了显示这一时代特征的扼要的词语,即(1)开阔通畅的海;(2)互相竞逐的海;(3)分别共存的海。这些扼要词语的设定是为了今后书籍出版时能让读者便于理解,并不是说扼要词语就能充分概括各个时期所有的事物和现象。此外,各个时期的叙述也并非严格限定在这一百年之内。为了明确地揭示各个时期的特征,在实际论述时也有可能上下都有所延伸。另外,作为一种实验,我们在时间上虽然选择了一百年,但探讨的结果倘若显示这一时期的特征无法归结到一点的话,也有可能举出数个模式来加以解说。之所以设定一百年为一个时间单位,说到底只是为了实际操作的方便而已。这一点希望各位读者予以理解。

为何选择了这三个时期呢?在复旦大学举行的会议中,中国方面与会者的问题几乎都集中在这一点上。若要描述东亚海域的特征的话,还有几个时期也可考虑。比如遣唐使时代的7—8世纪,日宋贸易兴盛的12世纪,与近代欧美关系很重要的19世纪等,都是很重要的可加以考虑的时期。他们的疑问很有道理。此外,有人认为,若从重视“中国文明”的角度考虑的话,论述15世纪以前的东亚海域并无多大的意义。

其实,时期的选择并无特别深的意义。这样的回答也许有点闪烁其词。我们这次做的是历史学的方法论的实验,选择任何一个时期都是可以的。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三个时期,只是考虑到参加我们研究会的成员的专业和愿望,选择这三个时期是最为现实的,也容易出成果。当然,这三个时期在世界史上

无疑都各有其重大的意义,而且,了解了各个时期东亚海域的特征的话,在今后建构新的世界史的时候,应该也会有很大的启示。

我再重复一遍,在这本书里对这三个时期的叙述,并不是对同一空间的连续的历史中截取的一部分。希望各位把它认为是将东海置于中央的三张空间画面,这画面的大小和图案各不相同,因为即便是同样的将东海置于视野之内来环视周边,眼前出现的景象也会因时代的不同而发生很大的变化。

虽说如此,这三个时期的特征中,到底什么是共通的,什么是相异的,我们要在叙述的内容和方法上下功夫,以期能对这些画面之间展开有效的比较。如果这三个时期的叙述过于松散,读者就难以有持续的兴趣,也就无法了解我们的意图了。因此,希望对三个时期的叙述几乎都从同一个角度和视点出发。现在将我们各个时期的叙述(分别称之为“部”)内容概括如下。

各部的最初部分都设置一个“时代的构图”,对各个时代的东海海域的概观和特征进行叙述。没有时间的读者只要阅读这一部分,应该就可知晓这一部的要点和撰稿人想要强调的内容。其次,我们将与海域有关的人分成三个范畴,即:(1)握有该领域权力的人以及与此关系密切的人;(2)与航海和贸易相关的人;(3)在沿海生活的人。再对上述各个组别的人在各个时期的东海海域中所起到的作用加以说明。此外,还要对各个时期成为海域交流舞台的港市和在此展开的贸易的实态、外国人社区(请注意,“外国人”这个词本身具有近代的语感)、外国人管理等的特征加以叙述。并且,还将从海上运输的物品的角度来论述各个时代东海海域的特征,对有关技术、学术、美术、信仰、思想等,即广泛意义上的“信息”相关的要素的接受、排斥和融合的诸种实相加以说明。

最初我们是计划在复旦大学举行的会议之前将有关这三个时期的想法归纳起来,由各个研究小组的代表分别报告各部分的概要。但出人意料的是,将各种想法归纳起来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很遗憾我们只能更改方针,在复旦大学的会议上只能以个人负责的方式作与这个三时期相关的报告,因此,这次论文集集中所收录的日本方面的论文,并未采取我们将在今后计划出版的书籍中所使用的统一的叙述方式。因为这次完全由报告者文责自负,所以从形式上来说,有的类似于各个时期内容的中间报告的一部分,有的纯粹只是个人的研究报告。在我这一“总论”中所强调的革新性,从整体上来说并未充分体现出来,这是要向各位致歉的。

在论述“东亚海域”的时候,必须要对东海及其周边的自然环境这一舞台展开进一步的考察,必须具有这一方面的知识。因为这一海域内人口的流动和物品、信息的动向,无疑都要受到这一舞台的影响和制约。这一点,我们必

须坦率地承认,我们受到了布罗代尔《地中海》的强烈影响。这次会议中,冈元司、吉尾宽两位发表了这一领域的中间报告。

## 由团队进行的共同研究

我们研究会的第三个革新性,是在研究会参加者意见一致的情况下,由撰写小组共同来记述这样的一种新的研究成果报告的形式。通常的共同研究,往往是就某一个主题举行数次研究会,然后以讨论会上的意见、信息和启示为基础,每个参加者撰写个人论文,然后将其汇集成一本书。

但是,我们举行研究会并不只是发表意见交换信息,而是全体成员对发表的观点进行彻底的磨合,最后整合出彼此认同的观点,再由数位研究者共同执笔撰写文稿。我们采用的是这样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三十几位参加者,可从各自的兴趣出发,自由加入这三个时期研究小组中的一个,这三个小组就成为文稿撰写的单位。

实际的文稿按照如下的顺序撰写:首先,举行好几次全体会议,反复进行意见和信息的交换,决定以负责以上三个时期的三个研究小组为单位进行研究和叙述。各个小组在组内进行反复的讨论,基本确定文稿的内容和概要,然后由数位执笔者整理出初稿,在全体会议上交给其他小组的研究者审读,征求大家的意见。此外,为了形成可供比较的文体上比较平衡的文稿,在全体会议上对三个小组的文字叙述风格进行调整。我们还将初稿出示给与研究会无关的外部人员,以征求大家的意见(在复旦大学举行的会议也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我在这一文稿的执笔阶段,也参考外部人员的意见,各部的执笔负责人对文稿进行最后的修改。因为这是在全体成员进行充分的意见和信息交换的基础上达成一致意见之后的撰写,所以出版后的书籍应该是全体成员的共同研究成果。

实际上,研究会的运作和撰写活动的调整相当困难。因为研究者之间的意见各不相同,经常会出现激烈的争论,另一个方面,执笔者的日常工作也都相当繁忙,大家要统一步调来准备文稿也极为困难。若按照通常的共同研究的做法,在适当的时候就停止全体成员的会议,接下来就是各负其责完成自己的文稿,文稿之间即便有些许龃龉,对此也就视而不见,进行最低程度的编辑之后付梓出版。这样做要简单得多。

我们之所以未采取通常比较容易的做法,其原因之一是鉴于目前历史研究的过度细分化的现状。每个人论文的论点往往过于琐碎,很难在历史研究的整体中来把握这篇论文的意义。甚至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好不容易写出来的论文,结果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其他人能理解其内容。



我们是为了什么目的来研究历史的呢？至少，如果其他的历史研究者、人文科学研究者不能理解其意义和价值的话，我们的研究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即便对于细小的问题也严加考究、试图从中发现历史研究的醍醐味，但也应该对整个的图景重新加以勾画，现在应该已经到了这样的时期了。通过这样的研究工作，相关的研究人员应该弄明白，以前我们自己觉得明白的研究或叙述的框架到底有没有问题呢？通过以前的研究什么已经弄明白了，什么还没有弄明白呢？现在我们应该研究什么呢？现在我们是是不是有必要对研究的方向性、研究的方法展开讨论呢？这些问题，是促使我们进行这次实验性研究的动力。虽然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实验，至少我本人确信，由年轻的研究者来从事的这项实验具有重大的意义。

## 结 语

在本文的开头就已经论及，我们的研究会，是“东亚的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这一共同研究项目中的一部分，我们的研究活动，一直在运用这一大项目中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我们之所以能够将日本各地的研究者汇聚在一个地方频繁地举行研究讨论会，是借助了这一大项目的资金援助。这里再次向小岛毅先生及相关各位的协助和厚意表示感谢。

“东亚的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这一项目将于 2010 年 3 月结束，我们活动的主要部分也必须在此前结束。在研究会的讨论过程中，有很多应该重新研究的课题浮现在我们面前，但已没有充裕的时间来进行新的个别研究了。因此，我们这一次的研究尝试，主要是想尽可能地运用历来的日本的研究成果，将以往的研究成果用“东亚海域”这一新的分析概念进行解释和综合，恐怕这一尝试也只能进行到这一地步。

从这一意义来说，这次试验性的共同研究及其成果，应该成为今后进一步开展的共同研究和个人研究的基础。我们将借鉴和参考各方面的意见，包括在复旦大学的会议上获得的各种有益的提问和批评，来进一步地完善我们的研究方法，并开展新的富有意义的历史研究。

（徐静波 译）